

梁启超《庸言报》融入民初政治的路径研究

王润泽 谭泽明*

[摘要]《庸言报》是梁启超归国后所办的政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在民初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在《庸言报》发表各类文章50余篇,利用该报凝聚政治共识、制造舆论声势、组织政治势力,深度融入到自己的政治活动版图中,彰显了报纸媒体在民初政坛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梁启超借助现代媒体实现了入阁目标,《庸言报》的目标得以变现,其命运也随即走向衰落,沉入历史的故纸堆。梁启超《庸言报》融入民初政治的历史,显示了近代中国报纸嵌入政治生活的特质,揭示了近代中国报纸与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键词] 梁启超;《庸言报》;民初政治

与闻名于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知名报纸相比较,梁启超主笔的《庸言报》^①在知名度、影响力和办报时间等方面似乎均有所不及。然而,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天津横空出世的《庸言报》,携任公之威名及众多名家之如椽之笔,辐射全国,创造了民初新闻界的一个奇观。作为一份政论性的报纸,梁启超“以口舌笔墨争竞”^②,借之鼓噪政治主张和扶植党务,是其利用新闻媒体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生动实践。民初政治人物利用报刊等新式媒体,积极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政治重构,是当时的历史特征,彰显了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状况。梁启超,那个时代“舆论界之骄子”,“四十岁,始归国,参与民国新政”^③,进入“第一流之人才内阁”,终于实现了其亲身参与政治治理的理想。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庸言报》的言论活动,是其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铺垫和辅助。可以说,《庸言报》作为新式媒体,深刻融入了民初的政治生活,推动了梁启超入阁的步伐和节奏。

一、投向共和的梁启超和《庸言报》

清季之末,民国初造,梁启超长期致力于社会改良和国家建设问题,与当时的政治活动保持着密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2;谭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100872。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15ZDB140)阶段性成果。

①在许多研究著作和论文里,《庸言报》通常被称作“《庸言》”,个中缘由比较复杂,既有历史转述原因,也有约定俗成的原因。仅就该刊样本本身而言,也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使用有两种不同的称谓。以该刊第一号为例,封面正中书“庸言”二字,正文内页页眉处是“庸言报”三字,版记中则署“天津庸言报馆”。本文根据梁启超私人信件以及同时代人的一些回忆资料,倾向于使用“《庸言报》”这一称谓。更加细致的考证,仍有待确切的史料加以佐证。

②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0页。

③梁启勋:《梁启超小传》,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页。

切关系。维新变法活动自不待言，他与师傅康有为亲身参与了“百日维新”。清末的立宪政治活动，也有梁启超隐蔽活动的身影。实施“预备仿行立宪”之前，清政府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考察报告和有关奏折就出自梁启超之手^①。清末的宪政活动，梁启超虽为清政府通缉的要犯，却是名副其实“背后的设计者和总顾问”^②，在暗中策论遥控。梁启超悬居海外，却并没有远离政治核心。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政治上抛出“虚君共和”、“开明专制”等理论，加紧与袁世凯联络，寄希望在新政府中大有作为。当此之时，梁氏自告奋勇，欲在民初的舆论界扶助袁世凯做出一番事业。

武昌首义之后，梁启超就开始寻找时机回国。然而，归期多磨，“商量归国，又商量了几个月”^③，至1912年底方才成行。这段时间里，梁启超曾委派蓝公武、罗癭公、麦孟华等人于袁世凯、章太炎等国内各派势力接洽，探听虚实，寻求联合。1911年11月初，蓝公武向梁启超报告，分析南北形势：“项城虽有权术，然在今日南北兵力对抗之际，固其世界，而至用兵之时告终，以口舌笔墨争竞时，则彼之能力甚薄，盖武力者仅可以对抗武力，若国会报馆等，则非武力所能抗者也。”^④蓝公武的报告无疑对梁启超决策产生了影响。在联络吴禄贞起事不成后，梁启超明显加紧了与袁世凯的联系，多次献策以进，对其进行思想上的说服工作。1912年2月23日，袁世凯覆梁启超电说：“力小任重，承贺惭谢，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无极，尤盼禊教。”^⑤这是一条内涵丰富的电文：“力小任重”表明袁世凯已经承认并乐于接纳自己在当时独一无二的地位；“迭奉函示”表明，梁启超及其属下应该是不止一次向袁世凯陈表献策，沟通交流；“尤盼禊教”表现了一种试探性的政治态度，模糊但不失审慎，显示了袁世凯老道的官场手腕。

辛亥革命之后，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角力的触须差不多都汇聚到了袁世凯一人身上。在短时间内，袁世凯迅速成为“旋转乾坤”的历史人物，是各方政治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张謇等立宪和保守势力自不例外，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也表现出主动合作的意愿。孙中山自海外归国，旋即被南方各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给袁世凯去电，向其解释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原因，并作出承诺：“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⑥民初的袁世凯是清政府遗产的最大继承者，被誉为“中国之华盛顿”。对于这样一个实权派人物，梁启超加入到拉拢的行列自然也不奇怪。同时，梁启超还积极与袁世凯集团其他人物建立联络，包括梁士诒、杨度等人，凝聚力量。在给杨度的信中，梁启超说：“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⑦

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的一个重要资本，就是自己在舆论界的影响力。梁启超认为，袁世凯可以坐镇指挥，“理财治兵”，而自己可以转移舆论，为之鼓噪，两者可以交相为用，“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⑧袁世凯主导在前台，梁启超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在后台，两者互为支持。梁启超劝说袁世凯：“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⑨梁启超的这些主张是他寻求与袁世凯联合的路线图。

在归国之前，袁世凯及其幕僚多次与梁启超沟通，商议舆论鼓吹活动，相互试探。袁世凯的幕僚梁士诒频繁催促梁启超鼓吹言论，在舆论上为袁世凯造势。1912年2月13日，梁士诒《致任公先生电》：“惟

①根据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的研究，梁启超确实参与了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活动的考察报告撰写工作，已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5篇原件。具体可见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另，学者董方奎也认为：“五大臣是通过熊希龄与梁启超、杨度联系并请其代拟考察政治报告的。熊希龄随五大臣于1906年元月途径日本时，遂请杨度、梁启超代写考察宪政报告，由梁执笔撰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折文章，梁启超并协助杨度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两文。”参见董方奎：《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②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第33页。

③④⑦⑧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0页、第580页、第569页、第569页、第617页。

⑤袁世凯：《覆梁启超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03页。

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来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40页。

兄决计在野，项城恐孤立，故暂照尊请，力任鼓吹。”^①3月15日，梁士诒再次致电梁启超：“电请兄先到京，后到沪，请先著小册子鼓吹。”^②为了配合袁世凯的政治进程，梁启超在国内印行过《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③等小册子以为策应。梁启超的这些活动，一方面是自己营造舆论空间，希望能在新政权中有所图谋；另一方面，也是与袁世凯集团暗中寻求联合的一种表示，希望能靠上袁世凯这个时代实力派人物。

此外，梁启超热爱言论事业、格外钟情于“向导国民”的人生追求，也是他归国创办《庸言报》的一个缘起。对于报刊职业，梁启超说：“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④他对新闻纸的熟稔程度，以及丰富的办报经验，也促使他乐于从事报章事业，“此次归来，仍思重理旧业。人情于其习熟之职业，固有所不能舍耶”，“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⑤

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归国后的办报活动，不仅与袁世凯政治势力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为袁世凯政治事业做摇旗呐喊的工作，而且是其自身政治事业的需要，也容易发挥他的长项。有研究者就认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⑥

1912年底，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到国内的梁启超，在京参加了社会各界组织的密集招待活动；随后“返津后闭户十日”^⑦，于12月1日在天津出版《庸言报》第一号。1913年4月，《庸言报》加入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北京报界同志会”^⑧，该报的社会影响在短时间内达到顶峰。

《庸言报》由天津庸言报馆编辑出版，位于当时的天津日租界旭街17号，正蒙印务局印制，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广智印书局代理销售。《庸言报》主要撰稿人包括当时颇具社会影响的严复、林纾、夏会佑、吴贯因、陈家麟、丁世峰、周善培、蓝公武、麦孟华、黄为基等，可谓汇聚一时豪杰。这些人有的是学问名家，有的是社会名流，有的是追随梁启超多年的同党或挚友。

《庸言报》第一卷的编辑人为吴贯因，发表多篇颇具影响的政论文章。然而，该刊每期封面都有“新会梁启超主干”字样，并在扉页印有“梁启超启事”，声明文责自负。由此可见，梁启超是实际意义上的主笔，是该报的主心骨。第二卷编辑人为黄远庸（即黄远生），在版式和内容上尝试过一些创新。然而，随着梁启超的离去，以及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失势，黄远庸未能力挽狂澜，《庸言报》最终停刊了。庸言报馆的后续工作，转由中华书局和《大中华》杂志承接。^⑨

《庸言报》为雕版印刷，每期约10万字，前后共出版30期。第一卷为半月刊，发行24期。第二卷改为月刊，发行6期。梁启超主笔期间，《庸言报》除正刊定期发售外，并有《庸言报》每月的选本销售。选本《庸言报》主要摘录上月两期的政论文章，版式不变，单本销售，封面仍是“庸言报”。目前，选本的《庸言报》共见12期。

《庸言报》在社会上所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梁启超预想。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⑩时人姜泣群作《庸言报颂》，载于《顺天时报》，认为：“天津日界庸言馆，漫拟他年作润河。”^⑪《庸言报》第七号后发行量增加到1.5万。在当时，这样的发行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也超过了梁启超以往所办的多种报刊。个中原因，与梁启超的声誉、地位、政

①②⑦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4页、第619页、第656页、第661页。

③《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共和建设讨论会1912年印行，厦门大学图书馆藏。见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④⑤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报》1912年第1号。

⑥林家有：《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⑧《报界同志会之议决案》，《申报》1913年4月21日。

⑨据报载，《庸言报》“代派经理报费，近多收不如数，亏累日多，遂已暂行停歇数期。现由上海中华书局之范源濂君出头承接，继续出版。”见《梁任公之近况》，《申报》1914年10月30日。另，中华书局在1915年1月20日创刊《大中华》杂志，之后曾连续数日在《申报》刊登告启，声明承接《庸言报》事项，“庸言报因报费款收不能支持，遂已停刊。现梁任公诸君应中华书局大中华杂志撰述之聘，议定：凡订阅庸言报，未寄足之册数，概以大中华补足。”见《阅庸言报者鉴》，《申报》1915年1月25日。

⑪云江钓徒（姜泣群）：《庸言报颂》，《顺天时报》1914年2月11日。

治活动,以及社会对政论报刊的需求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对此,赖光临就认为:“惟庸言报之畅销,与时务报、新民丛报情形迥异。后两者以其言论刺激人心,而前者则似系于梁启超声望地位之号召。”^①赖光临倾向于梁启超声望的直接影响。当然,《庸言报》的问世,亦遭遇到负面的批评声音。有读者就认为:“议论之风发,文笔之流畅,诚足令人击节。惟循诵再三,仍觉浮言多而真言少。”^②

《庸言报》之名源于《荀子·不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大致的意思是说:日常言论要讲“信”,日常行动要讲“诚”。“庸言报”,顾名思义,就是一份严肃认真的言论报纸,重信用。在封面设计上,《庸言报》英语刊名“The Justice”,显示了梁启超试图超越党派、独立不倚的言论追求。

梁启超主笔期间的《庸言报》主要设有“建言”、“译述”、“艺林”、“特载”、“杂录”等五大栏目,重点发表文章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政论学术性论文占绝对大的篇幅。因此,《庸言报》是一份“以政论为主的理论性半月刊”^③,或者是“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④。“建言”栏所刊内容全是针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通论、专论、杂论、讲演等文稿;“译述”的内容包含世界名著、外论、杂译等;“艺林”刊登史料、艺谈、文苑、说部、文录、诗录、随笔等,其形式短小精悍,内容神奇古怪,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较高的可读性,并有一定的文化韵味;“特载”有国闻、外纪、摭言等;“杂录”则是刊发一些法令和时事日志方面的文章。

二、梁启超《庸言报》报章数量分析

梁启超在《庸言报》上刊发各类文章、访谈共50篇^⑤,其中有刊首词《庸言》1篇、“建言”文章33篇、“附录”3篇、“诗录”7篇、“访谈”4篇,其他2篇,绝对数量并不很大。然而,考虑到这些文章都是在一年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的,足能反映出民初梁启超的政治态度。在50篇梁文中,《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国道德之大原》、《治标财政策》、《宪法之三大精神》等文章属于连载性质,《多数政治之实验》仅连载一期,属于未完成的文章。其中,《中国立国大方针》作于1912年4月间,共和建设讨论会曾印刷两万册行世,《治标财政策》写于1912年的五、六月份,另有4篇梁任公访谈文章,均刊登于黄远生主编的第二卷,即1914年梁启超担任币制局总裁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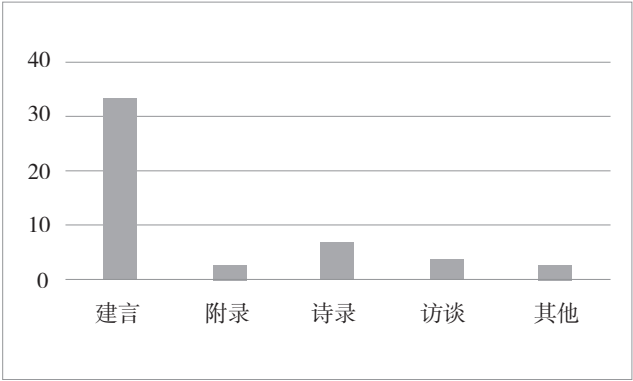
梁启超在《庸言报》刊登文章情况汇总表

序号	文章题名	栏目	卷数	期号	出版时间	序号	文章题名	栏目	卷数	期号	出版时间
1	庸言	刊首词	一	第一号	1912.12.1	26	说幼稚	建言	一	第八号	1913.3.16
2	国性篇	建言	一	第一号	1912.12.1	27	军事费问题答客难	建言	一	第八号	1913.3.16
3	政策与政治机关	建言	一	第一号	1912.12.1	28	瘦公以唐道士索洞玄所书本经经属题	诗录	一	第八号	1913.3.16
4	省制问题	建言	一	第一号	1912.12.1	29	罪言四:奖恶	建言	一	第九号	1913.4.1
5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建言	一	第一号	1912.12.1	30	同意权与解散权	建言	一	第九号	191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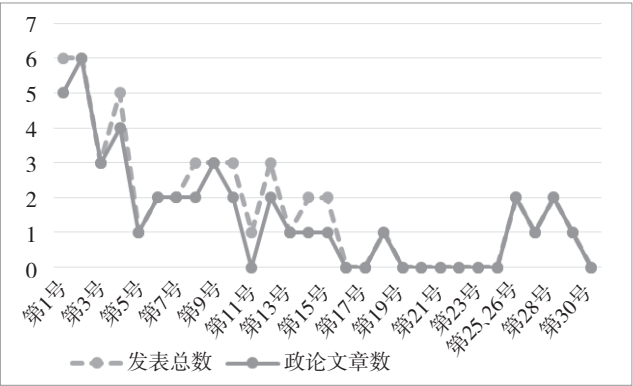
①赖光临:《梁启超与近代报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29页。
②燕侠:《读庸言第一号》,《顺天时报》1912年12月28日。
③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622页。
④马艺主编:《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⑤关于发表文章数量的统计问题,本文按照每期发表文章作单篇统计,一个题目下的连载文章被统计为多篇。有学者将连载的文章统计为一篇文章,如台湾学者张朋园的研究。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36页。

序号	文章题名	栏目	卷数	期号	出版时间	序号	文章题名	栏目	卷数	期号	出版时间
6	中国立国大方针 (未完)	附录	一	第一号	1912.12.1	31	暗杀之罪恶	建言	一	第九号	1913.4.1
7	中国道德之大原 (未完)	建言	一	第二号	1912.12.16	32	一年来之政象与 国民程度之映射	建言	一	第十号	1913.4.16
8	罪言一:名实	建言	一	第二号	1912.12.16	33	共和党之地位与 其态度	建言	一	第十号	1913.4.16
9	箴立法家	建言	一	第二号	1912.12.16	34	癸丑三日邀群贤 修禊万生园拈兰 亭序分韵得激字	诗录	一	第十号	1913.4.16
10	治标财政政策 (未完)	建言	一	第二号	1912.12.16	35	双涛园读书	诗录	一	第十一号	1913.5.1
11	论国务院会议	建言	一	第二号	1912.12.16	36	多数政治之实验 (未完)	建言	一	第十二号	1913.5.16
12	论审计院	建言	一	第二号	1912.12.16	37	进步党调查政费 意见书	建言	一	第十二号	1913.5.16
13	政治上之对抗力	建言	一	第三号	1913.1.1	38	庚戌秋冬间	诗录	一	第十二号	1913.5.16
14	治标财政政策 (续完)	建言	一	第三号	1913.1.1	39	进步党之政务部 特设宪法问题讨 论会通告书	建言	一	第十三号	1913.6.1
15	专设宪法案起草 机关议	建言	一	第三号	1913.1.1	40	革命相续之原理 及其恶果	建言	一	第十四号	1913.6.16
16	中国道德之大原 (续第二号)	建言	一	第四号	1913.1.16	41	奉题南海先生所 藏翁覃谿手写冯 天岩墓志	诗录	一	第十四号	1913.6.16
17	宪法之三大精神 (未完)	建言	一	第四号	1913.1.16	42	国会之自杀	建言	一	第十五号	1913.7.1
18	中国立国大方针 (续第一号)	附录	一	第四号	1913.1.16	43	感秋杂诗	诗录	一	第十五号	1913.7.1
19	国际立法条约 集序	附录	一	第四号	1913.1.16	44	进步党拟中华民 国宪法草案	建言	一	第十八号	1913.8.16
20	寿几道先生	诗录	一	第四号	1913.1.16	45	币制条例之理 由——梁任公谈		二	第一、二号	1914.2.15
21	欧洲政治革进之 原因	建言	一	第五号	1913.2.1	46	述归国后一年来 所感——梁任 公谈		二	第一、二号	1914.2.15
22	罪言二:鼎革	建言	一	第六号	1913.2.16	47	整理滥纸币与利 用公债——梁任 公谈		二	第三号	1914.3.5
23	宪法之三大精神 (续第四号)	建言	一	第六号	1913.2.16	48	银行制度之建 设——梁任公谈		二	第四号	1914.4.5
24	罪言三:才难	建言	一	第七号	1913.3.1	49	条陈改良司法意 见留备采择呈		二	第四号	1914.4.5
25	敬告政党及政党 员	建言	一	第七号	1913.3.1	50	甲寅上巳抱存修 禊南海子分韵得 带字		二	第五号	1914.5.5

梁启超在《庸言报》上发表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报刊政论性文章,包括政治论说、政治宣言、财政文章、政治访谈等等,总计41篇;另外一类是文艺类,主要是一些诗歌、唱和等文艺作品,共8篇。从梁启超《庸言报》发表文章的类型来分析,大量的政论性学术文章占据主要版面,是《庸言报》的一个典型特征,从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这份报纸的性质。梁启超坚持“文负其责”的原则,在启事中就称“启超所为文,皆署姓名,文中辞义,直接全负责任”。^①从梁启超《庸言报》发表文章的类型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在《庸言报》的刊文情况。从办刊伊始,梁启超就将《庸言报》打造成了政论重镇,连篇累牍的政论文成为该刊的灵魂。据此,将《庸言报》看成梁启超归国后的舆论宣传阵地,一点也不为过。



梁启超《庸言报》发表文章类型图



梁启超《庸言报》发表文章折线图

从梁启超刊文的时间分布分析,梁启超在《庸言报》的发文章明显与其政治活动有密切关系。在梁启超入阁(1913年7月)以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梁启超总共在《庸言报》发表了43篇文字,占总表的86%。从梁启超《庸言报》发表文章折线图中可以看出,在第15号《庸言报》(1913年7月1日出版)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超过半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仅在该报发表一篇稿子,即《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而根据《政府公报》刊文的统计,梁启超于1913—1914年间共发布了各类公文134件。此消彼长,梁启超在政治上的活动明显盖过了其在新闻舆论界的活动。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作为政治官员的梁启超不太适合再在公开场合评议政治,发表政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庸言报》在梁启超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不再重要。既然已经实现了最终的入驻内阁的目标,《庸言报》作为这一实现过程中的媒介工具,也便失去了其最初的价值。因此,通过研究《庸言报》,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梁启超借助报刊媒介实现政治抱负的操作路径,也能从中得出近代报刊融入民初政治的历史事实。

三、梁启超《庸言报》文章的质化分析

从质化研究来分析,梁启超主笔《庸言报》的办刊宗旨可以联系两个文献来解读,一个是刊首词《庸言》,另一个是“代本报发刊之宣言”^②的《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讲辞。这两篇文献同时刊发于《庸言报》创刊第一号,在思想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也与梁启超一生所从事的启蒙事业有相通的地方。

①梁启超:《梁启超启事》,《庸言报》1912年第1号。
②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报》1912年第1号。

梁启超在《庸言》中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其无奇也；一训恒，言其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①“训”是“说教”、“教导”的意思。梁启超根据实际需要，对“庸”的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即“普及常理”、“宣教公理”、“顺应实际需要”。“训常”、“训恒”、“训用”就是梁启超《庸言报》的办刊目标，具体来说，就是传播政治原理以推动影响政局的发展，按照自己的政治构想进行不断的思想启蒙工作。按照梁启超的意思，《庸言报》的目的是要传播普通的、恒久的、适用的治国理念和思想，摒弃“言之庞杂”的各种学说思想，而使“布帛菽粟夫妇之愚可与知”^②。换言之，梁启超的目的是：“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③

梁启超的这一主张看似典雅高深，实际上并未脱离其一贯的思想主张，即启蒙思想。这是一种社会精英的心态，从心理上承担着教化民众的职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殊角色认知。清末民初，一批仁人志士在全球化的资本浪潮中，深切感到当时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具体情形，纷纷举起了“启发民智”的大旗，梁启超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试图用一种士人理想化的图景建构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现国家自强；不遗余力地努力介绍新知，启发民众，引导时政，启蒙宣传。正如民初政党研究专家张玉法先生所认为的：“梁启超出身士绅阶层，早年对国民的态度与期盼，受严复的影响比较大，偏重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方面，亦即偏重在改造国民方面。”^④

梁启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积淀深厚、民智未开的国家里，立即施行民主政治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其态度仍主渐不主急，维持当时之政府施行保育政策”^⑤，推行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庸言报》所刊载的文章非常契合当时社会精英的认识范畴，也于国家建设有益，迎合了当时受众群体的胃口，得到社会精英分子的广泛追捧。《国性篇》、《中国道德之大原》、《中国立国大方针》等论文，向读者展现了他的思想研究成果。《治标财政政策》、《论国务院会议》、《论审计院》、《同意权与解散权》等文章是具有普及性质的，向读者介绍了民主国家政体的一些基本常识。此外，在很多文章中，梁启超结合中国具体国情，阐发其对于中国共和国家建设构想。他在《政策与政治机关》一文中说：“必有政治，然后可以言政策；必有国家有政府，然后可以言政治。”“一切政策非今日所亟亟，而惟求所以建设此可以行诸政策之适当机关为亟亟也。”^⑥在《中国之道德大原》中，他认为：“要之，凡一社会，必有其所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乎人人之脑海而与俱化”，要使国民养成“受恩必报之信条”。^⑦在《箴立法家》中，他指出：“当以法范人，不可对人制法。”^⑧其《宪法之三大精神》向社会普及了“国权与民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的问题。^⑨在当时的舆论界，梁启超主笔的《庸言报》深入讨论民初政治建构问题，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作为一个政论为主的理论刊物，《庸言报》的发行量能在创刊三个月后就猛增到1.5万份，足以说明该报在当时社会的受欢迎程度。

梁启超试图通过一种超然党外的态度传播自己的治国思想和救国方略，因此，在言论中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庸言》的英语刊名“Justice”来看，梁启超还是希望能在军阀政治和暴力革命之间寻找一条公正、独立的路线，减少国家的损失，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演变。当然，这只是编辑人自己期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梁启超的报章体“善用开阖之姿势，抑扬之音调，说至

①②梁启超：《庸言》，《庸言报》1912年第1号。

③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报》1912年第1号。

④张玉法：《从改造到动员：梁启超在政治运动中对国民态度的转变》，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⑤彬彬（徐彬）：《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3页。

⑥梁启超：《政策与政治机关》，《庸言报》1912年第1号。

⑦梁启超：《中国之道德大原》，《庸言报》1912年第2号。

⑧梁启超：《箴立法家》，《庸言报》1912年第2号。

⑨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庸言报》1912年第4号。

透辟处,往往入木三分”,在文中蕴藏“一种特殊势力”^①,往往能够影响和网罗一大批优秀人士。梁启超为文的这些特征,同样展现在《庸言报》的编辑工作中。有研究者就指出:“政论文是这个报刊的灵魂,而梁启超又是政论文章的灵魂。”^②从某种程度上讲,梁启超一直在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推动社会渐进式改革,即通过舆论鼓动,获得社会支持,然后登堂入室治理天下,走了一条从议政到参政的政治道路。在《庸言报》中,梁启超对于那些“不平”的性质亦表现出“鸣”的态度,多有批评之语。在《罪言四:奖恶》中,梁启超批评当时的政党和政府:“试问今日之政府、今日之政党,其所操之行,舍利用国民弱点外更有何事?质而言之,则奖恶而已。”^③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中,他对社会舆论不断制造“革命”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意见,^④这在人人畅言革命的时代,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庸言》所载梁文基本反映了其立场,“既批评袁世凯政府,也批评国民党,还表示拥护共和”^⑤,努力探索建设性的问题,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法和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讲,梁启超继续秉承着自己的社会改良思想,以及开发民智的启蒙思想。

在黄远生主持《庸言报》期间,梁启超仍是一位重要撰稿人,连续发表了《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币制条例理由书》、《整理滥发纸币与利用公债》、《银行制度之建设》、《条陈改良司法意见留备采择呈》等文章。梁启超从1914年2月19日开始担任币制局总裁,《庸言报》也成了梁启超系统阐发财政金融改革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⑥然而,相比于《庸言报》前期所造成的万人空巷局面,后期《庸言报》就显得凄凉得多了,直至逐渐消失于历史的故纸堆里,无声无息。

四、《庸言报》融入梁启超的入阁步伐

在民初政坛,梁启超是一位有重要政治影响的历史人物。对此,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自启超之归国也,当局诸贤乃至在野士大夫,多殷殷以政策垂询。”^⑦当时之中国,王权已逝,新政未立,活跃于政坛的,是社会各界的时代精英分子。例如,政界的孙中山、宋教仁等人,实业界的张謇等人,军界的袁世凯、黄兴等人,学界的章太炎等人,等等。梁启超算是政界和舆论界的一个领袖级人物。此外,梁启超似乎没有跳出中国旧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醉心于政治活动。正如学者张朋园所言:“他的思想虽然已有所蜕变,但他的行为并不能摆脱传统的约束。”^⑧梁启超的每一次办报活动都可以说是为其政治活动造势,《庸言报》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利用报纸之便凝聚政治共识。

创办报纸既是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的一个约定,同时,也是他甘心从事的一项工作。袁世凯看重的是梁启超舆论界骄子的影响力,希望他能够为自己摇旗呐喊。而梁启超本人对于报纸则有独特的情结,熟悉这种新式媒体的便利之处,特别是其鼓动舆论、凝聚共识的功能。这种新式媒体能在短时间内凝聚政治共识,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治决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较早接触并熟悉报纸活动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从《中外公报》《时务报》等都可以发现端倪。在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中,《时务报》的成功为其参与维新活动提供了机会,《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成功为其参与晚清立宪活动提供了契机,而《庸言报》的成功则为其凝聚保守派成员的共识并成功入阁提供了

①伍庄:《梁任公先生行状》,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6页。

②焦金灵、武占江:《从〈庸言〉易主看民初新闻传播界的新动向》,《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2期。

③梁启超:《罪言四:奖恶》,《庸言报》1912年第9号。

④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报》1912年第14号。

⑤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98页。

⑥李秀云:《梁启超与〈庸言〉杂志》,《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

⑦梁启超:《政策与政治机关》,《庸言报》1912年第1号。

⑧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便利。《庸言报》的政论文章,获得了旧立宪派人士、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民初政党团体支持。梁启超借此思想力量,经过运作,将他们合并为进步党。他把这些政党凝结在一起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国会选举中有所斩获,并期待抓住组阁的机会。在民初政党政治波诡云谲的博弈中,梁启超《庸言报》在保守势力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这也是其作为一个政论性刊物,发行量却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

其次,利用报纸之力营造舆论声势。

作为当时社会的新式媒体,报纸已经展现出巨大的舆论优势,影响和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康梁登上历史舞台,依靠办会办报,掀起一场维新变法运动;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通过组党办报,宣传鼓动,彻底推翻了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这种隐形而强大的传播力,是梁启超所格外器重的。赖光临认为:“《庸言》俨然是他的言论机关。”^①相较于其他时代人物,梁启超更加清楚报纸的优势所在,对报章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巅峰。清末民初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梁启超的文字引领时代风潮,每有好的文章登载于报纸,常常引发洛阳纸贵的局面。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数一数二的“舆论领袖”,他的言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社会的政治重建。有研究者就认为:“报章媒介的出现改变了政治治理、政治参与的基本形态,不仅政治与媒介紧密联系在一起,报界中人卷入到实际政治中也属正常。”^②在民初政党纷扰中,《庸言报》也掀起了一股保守舆论声势,在一个时期内,甚至发挥了进步党机关报的作用。梁启超在《庸言报》上曾发表《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进步党之政务部特设宪法问题讨论会通告书》、《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政党宣言和政党文件,实际上已经将《庸言报》打造成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无形中成了进步党一系的机关刊物”^③。在梁启超那里,报纸有“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代表着一定基层和集团利益,实际上是政治力量的某种延伸。梁启超对报纸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较好地把握了时代脉搏,是其能够长期屹立于时代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到《庸言报》,梁启超通过该报的声势,凝聚了传统的保守势力,为“第一流之人才内阁”营造了充分的舆论背景。

再者,利用报纸之机组织政治势力。

在清末和民初社会,报馆常常成为政治力量的聚集之地,是社会活动分子往来交集的社会机构。《苏报》《中国日报》等都曾是革命党人聚集和经常联络的地方。于右任曾回忆,革命派的《民立报》等报社组织,不仅承担了宣传革命的责任,而且承担着组织革命力量和革命具体活动的任务。^④梁启超在日本办报活动中,同样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周围,汇集了大批的保皇党人士和立宪派人士,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只是没有明确的政党组织名称。《庸言报》也不例外,梁启超以之为媒介,聚集了严复、吴贯因等政治精英人物,有些是传统势力的代言人,有些是新政府的重要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庸言报》已经具有政治组织机关的功能,成为梁启超组织社会精英、开展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而实际上,在当时,社会上的确有一股梁任公可能组织政府内阁的传闻。从《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等文章可以看出,梁启超是有组织内阁想法的,至少也是冲着财政总长职位努力营造支持力量的。然而,坊间传闻,袁世凯认为梁启超“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

①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第149页。

②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上):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27页。

③曾景忠:《从〈庸言〉看梁启超》,《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④清末民初,一些政治报纸的机构属性比较复杂,常常将报馆开办在各地租界,表面上从事新闻传播活动,暗地里也从事政治活动和秘密军事斗争。立宪派的报馆经常是立宪派人士聚会的场所,革命派报纸也常常是革命者的联络机关。对此,历史学界多有论及。参见刘廷涛编:《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于右任回忆说:“民立报社,成了志士会萃之所,也成了党人联络指挥的总机构。”);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4页(“时革命派的报纸不仅仅是舆论喉舌,同时也是革命的组织机关”。

重任”^①。最终,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梁启超虽然入阁,却只是担任了并不重要的司法总长职位。在这个过程中,《庸言报》的组织之功不可被忽视,新媒体展现出来的社会舆论已经足以影响到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

由上可以看出,《庸言报》很好地融入了梁启超的政治生活,帮助梁启超实现了入阁的基本目标。于梁启超而言,他应该感谢自己的报章才华和《庸言报》这个媒体,帮助其积累了特殊的政治资本,跻身政府上层。然而,《庸言报》的“庸”并不能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梁启超“为了实现理想,先要牺牲理想;既要支持强权,又要对强权加以规范”^②的做法,也无法改变统治者的一意孤行,其仕途注定难以顺利。1898年,梁启超参与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自己逃亡东瀛;1914年,梁启超参加“人才内阁”却毫无建树,选择辞去职位,亦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

五、《庸言报》落幕与梁启超失败的仕途经历

梁启超一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事政治鼓动,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梁启超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以文字宣传报国”。^③然而,可以说梁启超的仕途历程“成也报纸、败也报纸”,这一点可以从《庸言报》的发展历程找到某种印证。梁启超通过《庸言报》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共和国家政府,试图在现实中实践这种建构。历史证明,梁启超只是为自己的人生平添了又一段并不成功的政治履历。“舆论界之骄子”与政治家身份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一个坚持传统操守的转型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够磨平呢?

在《庸言报》创刊的半年多时间里,也是梁启超入阁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可以说是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庸言报》的发展伴随着“第一流之人才内阁”的组成而达到顶峰。之后,梁启超便忙于政务,“自从任公入政府以后,不暇执笔为文”^④,再也无暇顾及《庸言报》的发展了。编辑吴贯因也是写作能手,竭力维持;黄远生接过第二卷的编务,试图力挽狂澜,但都未能阻止《庸言报》陷入困境。黄远生发表《本报之新生命》的改革宣言,“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⑤,欲将该报打造成为“供给材料之宝库”^⑥,并约派记者定期发表梁启超的采访稿,以及创立时评专栏等,致力于扭转局面。但也仅仅维持了六期,便宣告结束。

《庸言报》的命运反映了梁启超政治生涯走势的特征,即“高开低走”,同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政治势力间的博弈。

首先,《庸言报》的政论主张已经跟不上时局的发展。

民初政坛,党派纷争,纵横捭阖,纷纷扰扰,“替本集团的头面人物在议会和政府机构中争夺权位”^⑦,报纸的兴废比较快速。随着国内政治局面的日益明朗,袁世凯逐渐掌控全局,《庸言报》和梁启超的存在意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庸言报》保守的政治主张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在政治上不能提出更加有吸引力观点的前提下,政论报刊的生存也将愈发艰难。例如,梁启超在《国

①据笔者拙识,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是董方奎的《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注释显示引自1913年9月8日出版的《时报》,原标题是《梁任公之入阁问题》。笔者查阅当日报纸,确有《梁任公之入阁问题》一文,但并未发现“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这则文献。后之论者多引用这则文献,作为梁启超不被袁世凯接纳的直接证据,如《熊梁进步党内阁的成立与失败》等。详见董方奎:《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文史哲》1980年第1期;张永:《熊梁进步党内阁的成立与失败》,《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王峥:《试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李炜光:《梁启超:中国公共财政的启蒙师与先行者》,《政法论坛》2011年第4期等。

②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③周兴樑:《近代中国报界之巨子梁启超》,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第771页。

④《梁任公之近况》,《亚细亚日报》1914年10月26日。

⑤⑥远生:《本报之新生命》,《庸言报》1914年第1、2号合刊。

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703页。

性篇》中论述“国性”问题,将“国语”、“国教”、“国俗”“三者合而国性”,“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①。这种论调,居高临下,充满夫子说教,难免虚浮,学术性意味很浓,实践性却不堪一击。此外,梁启超的文思也时常遇到阻碍,越来越多的政治挤压了每天的时间,致其分身乏术,“执笔两小时乃不成一字,(催稿急于星火)倾天将曙,兀兀枯坐而已。”^②纵观梁启超的一生,虽然在身边汇集了一批优秀人士,但缺少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很多工作都需自己亲力亲为,孤军作战。这样的结果就是,能否成功办好一份报纸,全赖一人;报纸的主心骨抽身离去,报纸的生命很快结束。《庸言报》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梁启超忙于政治活动,而其他撰稿人无法拾级而上时,报纸的发展前景当然可想而知。

其次,梁启超政治上的失意也注定了《庸言报》不可逆转的命运。

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历史的大转型时期,由旧时代转入新时代,身上带有明显的旧式文人特征,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格外看重。在梁启超身上,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这个特征:“学而优则仕”,“知其不可而为之”。民初的梁启超做到了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的职位,可以说是位居高位。然而,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的知识分子,又怎么能够在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权力斗争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呢?对此,民初人士、梁启超的好朋友周善培先生比较客观地指出:“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他在司法总长任内,没有作过一件受舆论称颂的事;在财政总长任内,却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他既无办法、又无魄力……”^③此外,政治上的暂时失意很容易击倒旧知识分子的脆弱内心。进步党在国会选举失败后,梁启超就难以释怀,“终日相对惟作悲观语,悲不可解”^④,表现出一蹶不振的态势。知识分子的气质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可以说相差巨大。梁启超空有一腔治国之气,却缺乏治平天下的手段和方法。作为进步党的一个领袖,其失意心态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可以说影响一片,包括《庸言报》。梁启超在仕途上的失意,对《庸言报》造成深刻影响,它存在的价值似乎不存在了。

再者,从政治生态上分析,梁启超和《庸言报》在袁世凯政治版图中的作用已经结束。

本来,在与革命派的斗争中,梁启超与袁世凯的联合是各有分工的,袁世凯主政治,梁启超主鼓动,互相协调。但随着袁世凯正式大总统地位的确立,梁启超在北洋政府的政治作用就显得不再重要。而此时,梁启超放弃《庸言报》,积极介入政府内阁,已经对袁世凯的地位和势力构成一定潜在的威胁。这是不为袁世凯所允许的。作为民初共和政府合法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有条不紊地实施着自己有效管理报纸的计划,1914年4月2日公布《报纸条例》,增添了许多限制性条款。5月1日颁布《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⑤将限制的范围笼统地规定为“法律范围内”,从而为自由擅断提供了宪法依据。^⑥根据《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总揽统治权”的大总统已经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再仰仗其他政治势力的帮助了。袁世凯步步为营的政治策略,岂是梁启超这样一个书生所能理解的?民初政坛的走势越来越脱离人们的预想,袁世凯的种种做法也诠释了历史发展的不合规章。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学堂上,面对坐下回忆当年:“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术之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⑦梁启超的这个评价,似乎隐含了某种怨气和旧知识分子的某种傲气。如何解读,只能见仁见智了。

①梁启超:《国性篇》,《庸言报》1912年第1号。

②梁启超:《梁启超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③周善培:《谈梁任公》,吴其昌《梁启超传》附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④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9页。

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法学会杂志》1914年第1、2期合刊。

⑥穆中杰:《管窥袁世凯政府的新闻法制》,《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5期。

⑦吴其昌:《梁启超传》,第121页。

结论和思考

综上所述,梁启超归国之后,立即着手创办了《庸言报》,为组党入阁做充分的社会鼓动工作。可以说,梁启超运用《庸言报》进行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比较丰厚的政治回报,部分地实现了传统士子治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对梁启超而言,“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之生涯也”^①,《庸言报》可以说是他们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微小片段。从这个微小片段中,我们能够管窥近代报纸在历史演变中的重要作用,更加细致地观察到新式媒体融入近代历史政治生活的路径,从而更加丰满地理解报纸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实质影响。换句话说,近代报纸不仅仅是近代历史进程的记录者,更是近代历史变革的实际参与者,已经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度融合,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进程。

本文探究《庸言报》融入梁启超政治生活的路径,试图理解近代报纸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特殊价值。作为一种新式媒体,报纸在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与西方有所不同。在中国,报纸直接参与政治建设、融入政治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也更加直接。统治集团对报纸的全面认识和掌握并非一帆风顺,新闻自由与“大一统”传统的博弈充满曲折,其中的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挖掘。仅就民国初年的社会而言,报纸最大限度地融入到了国家的民主建设,但由于过度依附于政治力量,从而也丧失了报纸的某些属性。这段历史值得反思和总结。

(责任编辑:高峰)

Liang Qichao's *Yongyan Pao*: His Approach to Political Career in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Run-ze, TAN Ze-ming

Abstract: *Yongyan Pao* 庸言报 (known as *The Justice* in English world) was a comprehensive publication featuring insightful political comments. It was set up by Liang Qichao af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from abroad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Qichao published more than 50 articles in *Yongyan Pao* in order to build political consensus, create public opinion and organize political force, and made the publication integrated into his own political activities deeply, which showed the special status and value of the newspaper in that period.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media, he wo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newly born government, but he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write articles anymore. Accordingly, *Yongyan Pao* began to decline and finally died out after a year. The history that *Yongyan Pao* helped Liang Qichao integrate his journalistic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highligh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 newspapers being deeply involved into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reveal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Chinese modern newspapers.

Key words: Liang Qichao; *Yongyan Pao*; politic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①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91页。